

赵一曼身世寻踪

新中国成立后,许多人或缅怀在苦难中不幸逝去的亲友,或踏上寻亲之路,渴望与失散的家人重聚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即是其中之一。

李坤杰苦寻失散么妹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,一直深深思念着自己的么妹李坤泰。自1928年小妹李坤泰从苏联回国后,便与家人失去联系,已二十余载。于是,李坤杰开始四处打探么妹的下落,一心希望能有个结果。

为探听么妹的下落,李坤杰多方奔走,绝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。每逢有外省干部入川,或有同志出川,她总会想方设法托人协助查访;只要是能够查阅到的书籍报刊,她都会认真细读,期盼从中找到一丝希望。1950年,得知正在川南行署监察委员会担任统战部部长的陈林,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李坤泰有过交集,李坤杰立即前去询问。一番交谈后,陈林说自己确实于1928年在莫斯科见过李坤泰,但此后的事情并不清楚。

此外,李坤杰还委托时任川南日报社社长的李力众协助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寻人启事。后虽未能如愿刊发,但《人民日报》的相关同志在回信中表示,此事已转交“组织部协助调查”,如有消息,会及时来信告知。

1952年下半年,随着川南行署的撤销,李坤杰从泸州调回了家乡宜宾。为了更好地寻找么妹,李坤杰尝试在家中翻找李坤泰的照片等辨识度较高的物品,但始终一无所获。恰在此时,李坤泰在宜宾求学时的好友郑双璧突

然登门,将一张照片交到李坤杰手中。郑双璧说,这张照片原是李坤泰在上海时托付给其妹琇石(后改名郑易楠),嘱其转交给李坤杰的,因连年战乱、音信阻隔,直至今日才得以送达。

接过照片的一刹那,李坤杰顿时泪如雨下,照片中正是她苦苦寻觅多年的妹妹李坤泰。这是姐妹分别二十余载后,李坤杰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模样。情绪稍定,李坤杰仔细端详,才发现妹妹怀中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,于是急忙向郑双璧打听详情,可惜对方并不知情。不过,郑双璧提到,如今在陕西宝鸡工作的妹妹琇石或许了解内情,随即将郑琇石的工作单位与联系地址一并告知。

李坤杰当即修书一封寄往宝鸡,不久便收到了回信。信中,郑琇石详细叙述了她在上海与李坤泰的交往点滴。例如,两人曾在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共事;自己曾帮李坤泰照料过孩子,后来因工作变动,李坤泰无奈又将孩子送至其丈夫陈达邦在武汉的老家抚养等事。然而在信的结尾处,郑琇石写道,自1931年分别后,自己便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李坤泰的音讯。

读完信后,李坤杰陷入更深的困惑中。妹妹如今究竟身在何方?妹夫陈达邦和孩子又在哪里?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反复盘旋,而这些未解的谜团,也更加坚定了其寻找妹妹的决心。

同乡何成湘提供了新线索

在反复阅读郑琇石的回信时,李坤杰又从中捕捉到几条关键线索。郑琇石提到,李坤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

化名“李一超”,平时交谈中还常常提及周恩来,似乎与周总理较为熟悉。她想,或许可以通过向周总理去信询问李坤泰的情况。

1953年5月,李坤杰鼓起勇气致信周恩来总理。信中详细叙述了李坤泰的个人经历,重点介绍了其在工作情况,同时也对妹夫陈达邦作了简要说明。同年9月下旬,李坤杰收到了一封署名“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”的回函。但是打开信后,李坤杰倍感失望。原来,周恩来总理虽收到来信,但因当年在上海工作时交集有限,对“李一超”这一化名并无印象。

李坤杰并未放弃寻找么妹的希望。1954年初,李坤杰得知时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江子能即将返回家乡宜宾,随后赴北京开会。于是,她委托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期间,帮忙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打听李坤泰的下落,江子能欣然应允。

在京期间,江子能偶遇了一位同乡、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何成湘。简单寒暄之后,江子能便提及宜宾李坤杰让帮忙寻找胞妹李坤泰之事。何成湘沉思片刻,说道:“电影《赵一曼》的主人公就是宜宾人,也姓李。你不妨回宜宾再仔细打听一下,看看是否确有其人。”之后二人越聊越深入,据何成湘回忆,抗战期间,自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时,曾亲自找过赵一曼谈话。当时赵一曼的身份已经暴露,出于安全考虑,自己曾代表组织让其转移至珠河游击区工作,并建议她改姓李。赵一曼却回答道,自己本就姓李。在珠河抗日游击区,群众都亲切地称她“瘦李”。说到这里,何成湘话锋一转,问江子能是否携带李坤泰的照片。若有照片,自己可以帮忙辨认。可惜江子能此行匆忙,并未携带,但他随即表示,返回后,定会与李坤杰立即寄来。

同年6月初,江子能从北京返回宜宾,把从何成湘那里得知的消息全部告诉了李坤杰。李坤杰当即翻印了妹妹仅有的那张照片,寄给了何成湘。

英雄身世的最终确认

当李坤杰四处奔走寻找么妹下落时,1942年从巴黎归国的陈达邦,也在四处打听妻子李一超和儿子的消息。自1928年两人在莫斯科分别后,由于通信困难,陈达邦仅在1931年收到过妻子的一封信。为避开审查,信中只简单写了“你的儿子已经出生,一切都好,不必挂念”,并附上了一张她与孩子宁儿(原名陈掖贤)的合影。回国后几经辗转,陈达邦来到堂兄陈岳云位于重庆的家中,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儿子陈掖贤。然而,当他向陈岳云探问妻子的下落时,却被告知李一超已在东北被日本人杀害。听闻噩耗,陈达邦泣不成声。

此后的数年里,尽管陈达邦父子早已得知李一超牺牲的消息,仍不断向各方人士探询李一超在东北时期的过往。1947年,陈掖贤居于南京时,四姐陈志贤告诉他:“你妈妈叫赵大姐,是一位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人。”而这一消息是从一个地下党员那里得来的。此外,1951年,陈掖贤遇到曾在东北工作过的文士祯。文士祯表示,从个人经历来看,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《赵一曼》中的情节极为相似,认为该片所讲述的“赵大姐”很可能就是李一超。但由于文士祯并未直接与李一超共事,并无确凿证据。

这边何成湘在收到李坤杰寄来的照片后,已基本能够认出照片中的人正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赵一曼,但为确保万无一失,何成湘亲自携带翻印的赵一曼照片,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进行核实,并走访了多位曾见过赵一曼的当事人。经多方验证,最终确定李坤泰就是赵一曼。何成湘随即于1954年8月23日复信李坤杰,告知查证结果。当李坤杰读完何成湘的回信后,一时间悲喜交集。

1955年初,李坤杰几经打听,得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(任弼时夫人),正是妹夫陈达邦的妹妹。李坤杰立即去信询问陈达邦与孩子的消息。不久,陈琮英回信传来佳音,李坤杰也终于找到了妹夫与孩子。而陈达邦父子通过李坤杰的来信也确切得知:李一超,就是赵一曼。

据《世纪风采》 王雅宁/文

名臣宗泽铁腕平抑物价

宋高宗登基后,东京(今河南开封)尚未从“靖康之耻”带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,商家们则趁机大肆涨价,就连百姓天天吃的馒头都涨到让人吃不起了。

这个局面引起了开封府尹宗泽的注意,他派遣几名亲信前往批发市场,购买了一些粮食,发现粮价与以往太平时期相差不大。接着,宗泽召集兵厨,亲自监督将这些粮食制作成笼饼,类似于现在的馒头,又让酒匠取糯米酿酒。然后,他仔细计算了笼饼与米酒的成本,结果显示,一个笼饼的成本只需6文钱,一觚米酒的成本是70文。而市场上笼饼每个卖20文,酒每觚卖200文,他决定平抑物价。宗泽找来了一个高价卖笼饼的商人,问他为何笼饼涨价的原因。饼商道:“大伙都提价……”宗泽拿出之前兵厨做的笼饼说:“这饼与你卖的饼轻重一样,成本只需6

文钱。如果卖8文钱,还有2文钱的利润。你高价宰客,罪应处斩。”

宗泽果断地下令斩了饼商,并发出通告:“笼饼只准卖8文钱一个,敢擅自提价者斩。”第二天,东京城中饼价回落到昔日水平。可问题还没完全解决。宗泽召来酒官,询问为何酒价提高了三倍,而都城的糯米并未涨价。酒官回答:“近来许多权贵亲属酿酒出卖,官酒若不提价,就亏本了。”

宗泽问道:“我若取缔了私酒,官酒每觚降价100文,能不能盈利?”酒官说:“如果大家来买官酒,至少是可以保本的。”宗泽拍板说:“你宣布官酒每觚降价100文。”第二天,官酒降价的通告张贴出来,通告上还有一句话:“有酿卖私酒者,无论多寡,抓住即处斩。”如此一来,私酿行为几乎绝迹。

据《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》 吴钧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标志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亮作